

鲁迅笔下觉醒知识分子的逃遁意识

——由涓生形象谈起

董 慧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 本文试图从涓生形象入手,揭示鲁迅笔下觉醒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逃遁意识及其成因。

[关键词] 鲁迅; 知识分子; 涓生; 逃遁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1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21(2007)01-0030-03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如涓生、子君、吕纬甫等;一类是未觉醒的知识分子,如孔乙己、陈士成等。以往,批评家们谈到觉醒知识分子时,总是着重谈及他们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和找不到方向的苦闷与彷徨,或者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无奈。笔者认为,如果说强大的社会守旧势力是知识分子被挫败的外因,那么,千百年来形成的,又隐藏在骨子里的逃遁意识则是不可抗拒的内因。那些所谓的悲哀、苦闷和无奈也只是弱者无力改变生活的堂皇的措辞,他们的逃遁意识决定了他们怕担责任、怯于斗争、碰壁则妥协,妥协必沉沦的行事方式。这些注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

我们就从涓生谈起。

涓生是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有人说爱情是生活的奢侈品,而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无论子君与涓生曾经是怎样的海誓山盟,都必然要面对柴米油盐的日常又琐碎的生活。因此本文摒弃了对涓生和子君爱情观念的分析,直接将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试图从涓生面对世俗的压力、内心的情感和承担的责任这三方面揭示他的逃遁意识。

涓生惧怕世俗的压力。

从传统道德角度来看,子君与涓生的结合是未婚同居,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所以世俗的压力是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涓生的逃遁意识已经初露端倪了。从会馆搬到吉兆胡同是一种隐讳的逃避。涓生的寻求住所表面上看是想为子君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实际上是两人从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一般人在做了什么错事(或自认为做了不光彩的事)后,往往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那么涓生的迁居有无这种打算呢?如果有,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或自以为做了什么错事呢?在这里,作为弱者和从属者的子君态度是明朗的:“和他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1]而涓生却迟缓得多。是“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2]从一开始,涓生就不如子君那样坚决。态度的犹疑不定使得涓生

特别顾及别人的感受。一旦周围的人指手画脚,他立即就慌了阵脚。所以,对于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3],子君“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4]。涓生则是“一不小心,便使得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5]。涓生害怕了。这“瑟缩”和“骄傲的掩饰”就是证明。本性的懦弱决定态度的犹疑,态度的犹疑又使涓生极度的敏感和自卑。当各种压力袭来无法接受时,涓生只能选择逃遁。由此可见,涓生可以洋洋洒洒地对子君高谈家庭专制,男女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君那“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6],或者说是子君对涓生的赞许和崇拜给了他男性的尊严和骄傲,给了他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但这种力量如同温室的花草,在经历了风吹雨打后就会折损殆尽了。男性的骄傲又不允许他承认这种力量的丧失,只能以一种逃遁的方式来掩盖内心的空虚。找一个美丽的借口,来一次浪漫的逃亡,再用骄傲和反抗做一袭宽大又华美的袍,来遮住颤抖的身体。

从叙事视角来看,《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进行第三人称固定内聚焦型叙事。始终以涓生的视角和意识为核心叙述这段凄美的爱情悲剧。所以我们有太多的机会站在涓生的角度来感知涓生的态度和思想,以至于很轻易就会陷入他所编织的美丽的谎言中。可是,一旦我们理智的思考,就会发现他思想与行动的矛盾。

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涓生是退缩的。

历经了失业的打击,涓生终于悟出了饿肚子是他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高谈阔论和海誓山盟都不能代替肚子饿的问题,曾经以为自己是英雄,是先锋的涓生在实际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了。要么饿死,要么寻找新路。涓生固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者,更不是唯爱情主义者,所以他开始寻找生存的新路。“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7]当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引起的四面楚歌危及到他自身利益,他隐隐的埋怨并暗想要抛弃子君。聪明的涓生当然知道,如果直接的主

[收稿日期] 2006-09-06

[作者简介] 董慧,女,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动的抛弃必然会受到舆论甚至自己内心的谴责。索爱时的主动是一种勇敢,弃爱时的被动才是一种明智。如果能让孩子主动离开自己,那么自己就是爱情的失败者,情感上可以引起别人的同情,在道义上、责任上也都逃脱了罪责。那怎样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由于爱结合在一起,如果爱随风而逝了,分手就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涓生就像“提出骄傲”一样,提出自己的冷漠,故作“不爱”之状。

失去了油鸡之后涓生明知子君的痛苦,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反而借口“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被“逼”到通俗图书馆。在那里,涓生一遍又一遍的幻想着子君的主动离开,同时又在竭尽全力地寻找出让子君离弃的理由:“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8] 纯情、稚气又深爱着涓生的子君总是不能又不愿理解涓生的种种险恶用心。终于,涓生按耐不住了,说出了那些足以令子君死亡,却可以让他暂时解脱的恶语:“……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9] 随后,涓生又预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

在文本的叙述中,涓生是个具有极端分裂性格的人。起初和子君爱可以让原本懦弱的他抛弃一切,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情怎能在分手时没有丝毫的留恋呢?我们在涓生的叙述中只看到了子君由鲜活变得庸俗,直到可厌,涓生对其的情感也由朝思暮想很快就变成眼见心烦。这种感情的突然变故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鲁迅先生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种悖论性存在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涓生在说谎!

在抉择时,涓生不是左思右想都没有想到子君的好,而是根本不敢去想,他没有去拷问自己是否还爱子君,而是急切地寻找子君的种种缺点来逃脱罪责。他从来没有在生存和毁灭之间挣扎,他是一直处心积虑地在生存的道路上跋涉!在重重压力下,他竟然没有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为了生存,他将所有的情感和追求都抛弃了。我们暂且不谈涓生此时是否爱着子君,因为涓生本人对于这个问题连想都不敢想,我们的种种猜测都是无稽之谈。

这就是涓生,一个处处逃避却为自己画地为牢的可怜人。

面对责任,涓生是在巧妙而又堂皇地逃避。

初读《伤逝》觉得就是涓生的忏悔录。从开始到最后都弥漫着感伤的味道。但他究竟忏悔的是什么呢?“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10]。涓生连篇累牍的忏悔竟只为了他说给子君的“真实”!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谎言。涓生与子君的结合是源于共同的理想,平等的人格。正像涓生所说,子君的勇敢无畏和琐碎平庸都是因为有了爱。有了爱,这一切的牺牲才有意义。如果双方间的感情真的消失了,那说给她听不但不是一个错误,还是对子君的一种尊重。因为子君不是一个摇尾乞怜的守旧妇女,她不需要这种施舍的爱。所以我们仍要探讨,涓生真的不爱子君了吗?他所标榜的“忏悔”是真的吗?

不可否认,涓生对于子君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会想不到子君离开他以后的处境,而且他也几次想到过子君的死(这其中是否含有一种期待呢)。但他仍然用“你可以无牵挂地做事”来为自己开脱。只是当子君死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好像、也许应该承担责任。那么,避重就

轻吧,他承担了这样一个“不该说出真话”的责任。于是乎,情感上他没有错,因为爱是不能勉强的;责任上也轻多了,只是说了“真话”。同时还可以把自己高置在勇于承担罪责并也应该是被同情对象的光亮地方。让大家觉得他从没有退缩。从情感的角度上讲,涓生的忏悔与周朴园的忏悔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忏悔的目的有三个:做给别人看,标榜自己的钟情;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自我赎罪;逃避在危难时将对方抛弃的责任。

涓生和子君的确没有结婚,但是没有婚姻的法律的约束,涓生就不应该为子君负责吗?难道涓生和子君的未婚同居竟成了涓生始乱终弃的理由?

涓生的懦弱和猥琐使他一次次从现实和情感中逃避着,他关掉了他周围的走向新生的一扇扇门,谎言和虚伪会变成绳索,将他紧缚在无光的狭仄的暗室里,直至窒息。

如果说,面对世俗,面对内心涓生的逃避是一种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逃避责任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要引起社会的愤激。不要说作为社会权利主宰者的男性,就是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涓生的逃避也是没有理由的。他必须承担子君之死的大部分责任,而他却机关算尽,只承担了“说错了话”的小责任。

涓生不敢面对现实的压力,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更不敢面对他应该承担的压力。涓生的逃避是隐晦的。他利用自己的所学编织了许多堂而皇之的借口,他巧妙地将自己叙述成一个情感的受害者,他狡猾地利用了读者们的同情心。可是这些都掩盖不住他骨子里的怯懦和逃避,他是一个可怜、可悲又可恨的弱者,以展览自己伤口的方式,逃避着自己的罪责。

其实,子君又何尝不是一个逃避者呢。

可怜的子君将与涓生的同居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一旦目标实现了她就安心地做起了家庭主妇。将她从前的理想、追求都放弃了。她以安逸的家居生活逃避外界的纷扰和奔波,以神情的冷漠逃避她和涓生之间已经出现的问题。她自从勇敢地做了同涓生同居的决定后,就不敢再冷静、客观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个决定对于她而言就像一个输不起的赌注,在不知道结果以前,不敢看,也不敢想。因为无论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觉得自己都无力改变。当她被涓生“逼离”时,当她不得已搬离吉兆胡同时,她甚至没有抗争,没有怨恨,只是在咀嚼伤痛中默默死去。她已不是原来那个敢爱敢恨的女战士了,或者说她在做那个决定是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勇气,剩下的只能是承受了。其实鲁迅先生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提到了娜拉们的归宿:要么回来,要么堕落。摆在子君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因为无力面对,所以只能逃避。

《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先生为数不多的婚恋题材的作品中唯一一篇描写爱情的“绝唱”。灌注在文本始末的一股强烈的虚妄和感伤的思绪给当时文坛众多呼吁个性解放、婚恋自由的热烈呼声,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冷却剂,也让人们看到男性在男权社会中得以逃避和伪装的明证。作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当时社会中无法逃避的婚恋问题。

关于觉醒知识分子逃避的表象,我们可以在许多文本中找到。

比如《祝福》中的“我”。由于读过书,认识字,又是出门人,所以“我”在鲁镇人眼里是个有权利重新阐释生活和命运的人。祥林嫂对我寄予了厚望。可是我面对祥林嫂关于

“魂灵”的拷问却瑟缩着不敢回答。最后只能以“我说不清”来解脱。而且还煞有介事的补充道：“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11]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安，生怕这件事于“我”有什么牵连。于是，经过一夜的思考，“我”决定“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12]在《祝福》中，“我”是个无奈与尴尬的“救赎者”。一方面，“我”想启迪愚弱人民的心智；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能力无以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所以只能退缩和逃避。

不妨再看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这个曾经到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的年轻人最终只得借酒避世。吕纬甫渴望教英文、渴望教算学，渴望教育救国，可是一切都被他所生存的社会所不容许。他也曾希望过，抗争过，在屡次失败后，他才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原来的起点上。于是，许多和他一样的铁屋子中的清醒者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为了自己的生计低头。他消沉了，宁愿把买给他喜欢的姑娘的“剪绒花”转送给令他讨厌的“像一个鬼”的阿昭；他麻木了，认为阿顺之死，不怪社会的无情，“只能怪阿姑没有这一份好福气”；他绝望了，甚至愿意仍旧去教违背自己愿望的“子曰诗云”。借酒浇愁，怀念过去，成为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消极策略。

作为一名先知先觉者，知识给他带来的不只是智慧，更多则是痛苦。魏连受作为一个个体的觉醒者被庸众视为“异类”，而后越发的孤独，最终“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13]当他面对那些渴望救赎又无法救赎的庸众的冷眼时，只能是绝望而沉沦于世俗。而肉体的沉沦并不能消解他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他在繁忙和热闹的氛围中的自我放逐，其实是在逃避对自己灵魂的强烈谴责。

那么，这种逃避意识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觉醒知识分子的一种“希望”崇拜。

鲁迅《故乡》有一段心理独白为我们证实了这种崇拜。

……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14]

在这里，觉醒知识分子对于“希望”的崇拜与农民的崇拜菩萨有神似性——都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偶像意识的表现形式，而且知识分子的“希望”崇拜比农民的菩萨崇拜还要更“茫远”。

农民崇拜偶像是因为他们现实生活中处于弱者地位，他们无力凭借自己改变这种地位，只能寄希望于菩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种虚幻的力量来主宰。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与强大的旧势力相比，永远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他们充满希望，善于想象却缺乏把希望变为现实的物质手段和物质力量。幻想、希望变成了“空想”，它的实际作用就是用自我欺骗取得心灵的慰藉与平衡，使知识分子借此逃避人生的苦闷与现实的残酷。这与农民的心灵麻痹、自我欺骗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落后民族、阶级集团所特有的偶像意识。

这是鲁迅先生最感痛心的。我们民族最可悲的这种劣根性是我们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他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把一切“偶像”——菩萨、神仙，皇帝连同虚幻的“希望”，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统统驱逐出去。一切的偶像、幻

想都抛弃了，就卸去了历史的负担，获得了精神的解放；然后才有了把握真实的希望，然后才可能从逃避走向面对。

其次，也是鲁迅某些思想意识的反映。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写过：“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5]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1925年确实有一个阶段“痛愤成疾”，“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16]在他的生命中笼罩着疾病和死亡的阴影，而他这种“希望生命从速消磨”而“故意拼命做”的心理，显然带着某种病态和自虐的倾向。他是在用自虐所形成的痛苦来转移精神的痛苦。在那个时代，以自虐转移痛苦的也不单是鲁迅。郭沫若就曾说过郁达夫“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17]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沉沦》。就是郭沫若自己，恐怕也有过“自我作践”的时候吧。在现代中国，经常陷于苦闷荒凉中的知识分子，偶尔出现自虐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是在绝望和不放弃的夹缝中挣扎的写照。

当然，鲁迅的自虐和逃避是暂时的。鲁迅一生都是逃避现实，脱离实践，无为而终的文人传统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鲁迅的逃避是一种痛苦的思索过程，痛苦过后，他总是以更勇敢的姿态振翅高飞。

曹禧修先生在《“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18]中强调了鲁迅先生的“诊者”身份，即叫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站在启蒙者高高在上的立场审视人民的苦难。当他看到涓生和子君等一些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生存困境之后，总想给其以精神上的指导，想以对他们的批判，引起青年的反思——并非同居就是个性解放，并非拔掉神像的胡子，挑剔祖宗的旧习就是革命；并非解酒浇愁，清议空谈就能救国。他用他的笔告诉大众，许多所谓的“革命者”还都只是穿这革命的外衣没有革命筋骨的逃避者。守旧的社会力量固然强大，但，中国革命更大的阻碍力量还是来自革命者逃避的自身。只有青年们摆脱“中庸”“稳妥”的余毒，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时，才能看见辉煌的曙色。

[参考文献]

- [1][2][3][4][5] 鲁迅·鲁迅全集[M]. 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14.
- [6] 同[1]. 111.
- [7] 同[1]. 120.
- [8][9] 同[1]. 123.
- [10] 同[1]. 127.
- [11][12] 同[1]. 8.
- [13] 同[1]. 100.
- [14] 鲁迅·鲁迅全集[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14.
- [15] 鲁迅·鲁迅全集[M]. 第十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79.
- [16] 许广平. 许广平忆鲁迅[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226.
- [17] 郭沫若. 郁达夫研究资料[M]. (上).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96.
- [18] 曹禧修. “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J]. 文学评论, 2006, (3).

[责任编辑] 乔淑兰